

## 司马相如赋和楚辞

坚 白

### (一)

作为汉赋奠基作家和代表作家的司马相如，他的创作和楚辞有着密切的关系，是楚辞枝干上长出的一束绚丽奇葩，是楚辞源头里涌起的一阵汹涌大波。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相如：

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悦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

笔者曾考相如游梁在景帝前元七年（前150），至中元六年（前114）梁孝王死相如离梁，前后凡七岁。梁王君臣，非常热心于楚声楚歌，史载“梁客皆善属辞赋”（《汉书·枚乘传》），《汉书·艺文志》也把枚乘赋九篇，庄忌赋二十四篇归为屈原赋类。因此，相如游梁期间无疑受到楚辞和楚辞派文人的熏陶和影响。武帝建元初年，相如入朝为郎，又和楚辞派文人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枚皋、东方朔、庄葱奇等同列，相互鼓扇，挡风骋势，辞赋创作，一时蔚成风气。

刘熙载说：“长卿《大人赋》出于《远游》，《长门赋》出于《山鬼》。”（《艺概·赋概》）钱钟书先生也指出《美人赋》“自是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之遗耳。”（《管锥编》“全汉文”卷）司马相如这三篇赋作无论在体式、描写及至语词上，都可以说是直接师承楚辞的。如《远游》有：

悲时俗之迫阨兮，愿轻举而远游；

《大人赋》则有：悲世俗之迫隘兮，揭轻举而远游；

《远游》有：下峥嵘而无地兮，上寥廓而无天。

视倏忽而无见兮，听惝恍而无闻。

超无为以至清兮，与泰初而为邻。

《大人赋》则有：

下峥嵘而无地兮，上嵒廓而无天。

视眩泯而亡见兮，听敞恍而亡闻。

乘虚亡而上遐兮，超无友而独存。

《山鬼》有：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

《九辩》也有：

悲忧穷戚兮独处廓，有美一人兮心不绎。

《长门赋》则有：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遥以自虞；  
魂踰佚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独居。

《山鬼》有：

云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昼晦。

《长门赋》则有：

浮云郁而四塞兮，天窈窕而昼阴。

《九辩》有：

愿一见兮道余意，君之心兮与余异。  
车既驾兮竭而归？不得见兮心伤悲。  
倚结辀兮长太息，涕潺潺下兮霑轼。

《长门赋》则有：

愿赐问而自进兮，得尚君之玉音。  
……修薄具而自设兮，君曾不肯半幸临。  
……雷殷殷而响起兮，声象君之车音。  
……左右悲而垂泪兮，涕流离而从横。

至于相如《美人赋》，通篇模写《登徒子好色赋》，只是把宋玉自叙和章华大夫补叙合二为一，其余问对之语气，所述之艳遇，词藻之靡旖，尽皆雷同，如出一辙，就不单是语句的复叠了。

相如游梁末年所作的《子虚赋》，是汉大赋的成型代表作品，不仅标志着相如辞赋创作的成熟，而且还标志着汉赋体式的最终完备。但是楚辞通过“出于宋玉《招魂》”的枚乘《七发》（《艺概·赋概》）语在《子虚赋》烙上母体鲜明的胎记。试对比：

于是乃发激楚之结风，扬郑卫之皓乐，使先施、征舒、阳文、段干、吴娃、闾嫫、傅予之徒，杂裾垂髻，目窈心与。揄流波，杂杜若，蒙清尘，被兰泽，燃服而御。此亦天下靡丽，皓侈广博之乐也。（《七发》）

于是郑女曼姬，被阿锡，揄纁绮；杂纤罗，垂雾縠；袿积囊结，纡徐委曲，郁桄谿谷。纷纷排排，扬旒戍削，蜚襜垂髻。扶舆猗靡，翕呶萃蔡。下靡兰蕙，上拂羽盖。错翡翠之葳蕤，缪绕玉绥。眇眇忽忽，若神仙之仿佛。（《子虚赋》）

将为太子驯骐驎之马，驾飞辀之舆，乘牡骏之乘。右夏服之劲箭，左乌号之彤弓。游涉乎云林，周驰乎兰泽，弭节乎江潭。掩青蘋，游清风，陶阳气，荡春心，逐狡兽，集轻禽。于是叔犬马之才，困野兽之足，穷相御之智巧。恐虎豹，冒鸷鸟，逐马鸣镝，鱼跨麋角。履游麋兔，蹈践麋鹿，汗流沫坠，冤伏陵窘。无创而死者，固足充后乘矣。此校猎之至壮也。（《七发》）

楚王乃驾驯駉三骊，乘彤玉之舆。靡鱼须之栖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将之雄戟；左乌号之雕弓，右夏服之劲箭。阳子骋乘，奸阿为御。案节未舒，即陵狡兽，鸷蛋蛋，犇距虚，扶野马，赍陶除，乘遗风，射游骐。侯矜倩俐，雷动焱至，星流霆击；弓不虚发，中必决眦。洞胸达掖，绝乎心系。获若雨兽，揜革蔽地。（《子虚赋》）

两相比照，楚辞和相如赋的传承关系就很明白了。

但是，司马相如整个创作活动所显示的创作成就决不是楚辞亦步亦趋的翻版，以《子虚》、《上林》二赋为代表的汉赋，在体制、内容、格调、功用以及节奏和词采方面，毕竟和楚辞又有不同。这除了文学本身发展和作家个人生平际遇等因素之外，社会结构和时代风尚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屈原的时代社会动荡，兵连祸结，屈原等人怀抱的理想政治无法实施，相反“忠而被谤，信而见疑。”（《史记·屈原列传》）。这反映在他们的作品里，就显出楚辞深挚优柔，纤回断续、怨慕哀伤、凄迷神幻的特色。

司马相如的时代，西汉王朝经过“文景之治”，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方面呈现普遍高涨的局面，至武帝朝初年“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廩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或群，而乘字牡者侯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梁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史记·平淮书》）中国封建社会第一次进入长期稳定巩固和繁荣昌盛阶段。反映这一特定时代的汉赋便应运而生。司马相如以赋描绘天地山川之美，日月星辰之丽，花木草树之富，飞禽走兽之众，宫殿楼台之伟，人物服饰之盛，豪聚宴饮之繁，狩猎巡游之壮，透露出一股勃郁亢奋、蒸腾昂扬的时代气息。于是，楚辞和汉赋之间，终于通过司马相如成就卓著的创作活动，划出一道界线，经纬分流了。

总括起来说，相如赋和楚辞分途，主要有以下数端：

第一，楚辞有着强烈的神话色彩，以及由美人香草组成的深婉的寓意系统。尘世理想的破灭和现实生活的失败，使楚辞的开创者屈原“驷玉虬以乘鸞”，驱驾着望舒、飞廉、鸾皇、雷师之属，朝夕苍梧具圃，寻求扎身的乐土。但是天国的美丽，还是抵消不了对“旧乡”的眷恋。而寄予厚望的美人香草，又“缤纷变易”，人间也不可淹留，绚丽的色彩掩饰不住日暮途穷的感念。而相如赋却洋溢着现实精神，人世的主题突出，天国的色彩消退。它通过对尘世生活和周围世界的热情赞美，表现出对人生和世界的信心。偶而笔涉美人香草，也概无兴寄寄托，而纯粹作为繁华世界的一种点缀。楚辞表现出对人的世界的失望和对神的世界的憧憬，相如赋则表现出对人的世界的满足和对神的世界的淡漠。

第二，楚辞较近《诗经》的“国风”，重视言志抒情。“苟余情其信娉以练要兮，长颯颯亦何伤！”“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离骚》）、“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九章》）等等，体现出一种百折不回，“死而不容自疏”的执着精神。楚辞，尤其是屈原的作品，“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史记·屈原列传》）诗人虽然在混乱的政治斗争中失败了，被放逐出朝廷，但他的作品里总结古今历史经验，对祖国的兴亡盛衰表现出强烈的关注。“亡国之音哀以思”，这一哀一思，就是屈原作品的内容特色。而相如赋却较近似《诗经》的“颂”，咏物颂美，夸张声貌，是辞人文士之作。相如赋很少言及时事历史，一篇《弔二世赋》，全文仅123个字（据《汉书·司马相如传》），却有一半以上的篇幅描绘宜春宫的嵯峨，曲江水的湍急，南山的参差和林木的蓊葭，点题的只是“亡国失势”、“宗庙灭绝”，冢墓芜秽，亡魂无归数句，虽然形貌上承袭了楚辞的体式，但是缺乏楚辞缠绵深婉的抒情力量，而显得平缓滞重，

基本上是大赋的具体而微。相如赋更多地耽溺在眼前的豪奢世界里，对现实政治的优劣得失很少关注，虽然赋尾每每缀上一段规陈，所谓“曲终奏雅”，然而强弩之末，“劝百讽一”，它的成效被褒美之词淹没得几乎杳无影踪。楚辞感受着家国的灾难痛苦，深情绵邈。相如赋观瞻着时代的繁华纷披，心驰神往，表现出两种迥异的生活和创作态度。

第三，楚辞往往以作者自己作为作品的中心和主线，象《离骚》通篇叙写自己的家世、理想，以及探索和追求的过程；《九歌》描述自己和“湘君”、“湘夫人”、“少司命”“山鬼”等神灵的交往；《九章》各篇或言志、或述行，或比物自咏，或慷慨抒情，每一篇都有作者自己在。因而楚辞的主体意绪强烈，抒情气氛浓厚。而相如赋的中心主题往往是帝王及其皇家生活。象《子虚赋》的齐楚斗富，《上林赋》的天子游猎，《大人赋》的帝王求仙等等，描绘上尽态极势，穷物之变，“包举宇宙”、“总括人物”，然而较多地辅写场面，作者自己并不直接抒怀。和楚辞诉诸人们的心灵不一样，相如赋总的说只是诉诸人们的感官，因而缺乏使人迴肠荡气的力量。楚辞瞩目于主体的内心境界，而相如赋放限于客体的外观形态。

第四，楚辞在体式上整饬有序，节奏分明，象“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离骚》）“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东皇太一》）“时不可兮再得，聊逍遥兮容与。”（《湘君》）“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余。”（《湘夫人》）“哀吾生之无乐兮，独幽处乎山中。”（《涉江》）“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哀郢》）“心郁郁之忧思兮，独永叹乎增伤”。（《抽思》）“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惜往日》）等等，以之、兮、乎、而等虚字作为句腰，是楚辞的基本句式。这种句式节奏感强，便于吟诵。而相如赋——主要是他所独创的汉大赋——的句式，参差错落，长短无伦，是揉合诗、骚、纵横家言后新创的一种句式。这种句式长于变化，描述性较强，而节奏感较弱，有时还失之于拖沓臃肿。楚辞接近于诗，相如赋接近于散文。

总而言之，如果说，产生楚辞的时代动荡变乱，屈原等忠直之士遭谗受逐，在现实生活中苦无出路，常常遁入理想世界，上天入地，孜孜求索，因而作品显得迷离恂悦，局踣迫促然而真挚动人的话，那么司马相如赋，尤其是他所开创的汉大赋产生于蓬勃兴旺的时代，作者受到承平之世的鼓舞，面对琳琅满目的大千世界，欣喜雀跃，尽情讴歌，因而作品就显出宏富整贍之态，流光耀彩之色。它们是前后相继的两个时代的两大文学潮流。